

为什么身居管理阶层的 职业母亲面临多重难题

身居管理阶层的职业母亲往往面临多重现实问题。从社会舆论对这类母亲的关注来看，并非少数人感到迷惘。一些职业女性一个个开始有孩子以后，常常无法摆脱这种困惑，有时几乎是心神不宁。

“当然，我还没有孩子，没有切身体验，一旦开始考虑有一个活生生的孩子，而不是某个假想出来的小人儿时，我就会进一步发现我自己的弱点。揭开我那以往善于辞令、口齿伶俐的表面现象，却是一个意识混乱、精神分裂的女人，说起话来语无伦次，每周出现一次中度神经麻木感。”

成为一个无所不知的小女士，挟着一堆有关母亲和日托的统计数字的研究资料，与那些自己没有孩子却对怎样做母亲说得头头是道的年轻妇女一起高谈阔论，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母性研究中也有种种时髦，各种理论花样翻

新，你方唱罢我登场，最后，都像一件做工考究、剪裁合体的外套穿若干春秋后破旧不堪一样被扔掉了。

由公司出资，开办收费低廉的日托，是完全必要的。不仅对那些工作上无选择余地的妇女是需要的，而且对分娩后希望尽快恢复工作的妇女，也是可以考虑的选择。

日托是否是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最完美的方式，人们心存疑虑。如果一个人决定生孩子，她就理所当然地要承担抚育孩子的责任。如果把工作摆在高于一切的位置，而将这种责任，当作一件普通的事，心安理得地从一开始就全部委托给别人，这是很不应该的。

假如“选择”是妇女成功的基础——各种选择与今日妇女的地位有关，设想有一个尺度，在凭感情的选择与务实的选择之间作出权衡，这是一个典型的管理者的设想。这一来，要工作还是当母亲，实质上是一个处在管理阶层女人的问题，这个问题也要设定一个权衡选择的尺度。

如果没有选择的余地，只有将孩子送日托，孩子将来也许会原谅母亲的过错，因为母亲不能继续让孩子和家庭束缚住。

“当我与那些申请照看儿子的妇女面谈时，我想的却是企业家雇佣管理人员的情况，他们总是谈论这件事的难处，工作是多么的精细而且重要，而挑选一个合适的人来干这项工作又是多么难。”

“你能想象找一位合适的妇女来照看你的孩子是多么的重要吗？每天妇女都要做这样的决定，而这种决定远比那些男人们要做的各种决定困难得多，也重要得多。我要选择的妇女不仅要有我赞赏的气质，而且能喜欢我的气质，以及我作出的选择。因而，这正是挑选一位照看婴儿的保姆最困难的一个方面。如果一位照看你孩子的妇女因为你在工作就不把你当作一位母亲，或对你的生活方式，你的社交方式，你的经济地位怀有敌意，那么你就真正遇到麻烦了。

“或者假使你，作为一位有专长的女性，下意识地认为，不仅仅是小保姆，而且一切类型的佣人，都不如你那样受人尊重，你也会遇到一个严重的棘手问题。有些妇女抱怨她们雇佣的小保姆要求每月高出 500 元的工资。她们说，当保姆又不要什么技术，是个人就会带孩子。她们嘲笑这些保姆有点神经病。每当听到这些议论，我就感到义愤。

“多么虚伪的人啊！她们同样是女人，她们也会抱怨那些白领阶层的人，或公开哀诉职业妇女不平等的生活待遇，而她们在自家后院对待佣人并不亚于对待奴隶。照看儿子的姑娘在我的生活中给我很大的帮助，我非常感谢她。她的作用是无法估价的。她每天照料我的孩子比我每天在办公室工作还要辛苦。我完全体会到这一点。因为每逢周末和星期天由我和丈夫照料孩子，而每到星期日晚上，我们已是筋疲力尽了。

“自从儿子出生以来，我变了许多，我考虑问题的秩序完全变了。我仍然热爱我的工作，对待工作严肃认真，但是同以往相比方式上有所不同。我白天坐在办公室并不特别想念儿子，有时我甚至不向家里打电话询问儿子的情况。但是，我每天五点准时回家，工作上再没有重要得不能留待明天解决的事情。我为那些由于工作的特殊需要而不能在五点离开办公室的妇女们深感遗憾。

“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轻松、更幸福，现在我的生活出现了一种以前所没有的平衡，工作对于我来说仍然重要，但方式截然不同了，工作开展得更加顺利，我也更加健康。

“几年前，我去参加一次商业界的妇女联谊会，聆听我的一位朋友发言。许多上层阶层的妇女聚集在那次会议上。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得很清楚，那是在一个人发言的时候。

“这位演讲者谈她经历了一个做母亲和工作之间的矛盾冲突。她讲了一个关于她与女儿的故事。一次重要的销售会议预定召开

的日子与她女儿在学校演出话剧的上演时间是同一天（你曾听说过此类的事吧，然而这绝不是虚构的）。她感到非常痛苦，在履行工作职责和母亲义务之间举棋不定，最后她终于作出决定去参加销售会议。

“整个会场立刻骚动起来，欢呼声、鼓掌声、口哨声、跺脚声，一片喧哗，场面之热烈，好像西方国家公民刚刚举行了投票使得他们的候选人当选一样。我简直感到不可思议。并不是我不同意讲演者的决定，完全相反，我支持那个决定。

“人们这种强烈的反应使我感到不安。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对这件事和其中反映出来的道德观念的一种自然的赞许，这使我联想到观看体育比赛时，那些狂热的崇拜者的过激反应。在那些比赛中，崇拜者明显地倾向某个队或某个运动员。这种关系远远超出了观众和运动员之间的任何联系。”

究竟什么值得如此欢呼？赢者还是败者？仅仅根据某人或某一个队的输赢，就能决定其好坏吗？同样，在前面提到的那位妇女的选择中，谁是胜者？是这位妇女还是她的孩子？或是整个男性社会的精神气质？她的确向那个世界（应读为“男人”）显示了她没有母性那种多愁善感的情调。她直截了当地确定了事情的先后顺序，把工作摆在第一位。为了证实她在男性圈子里的价值，她必定会做出任何需要做的事。即使困难重重，她将勇往直前。

也许最困惑的是这群人的反应充满了女性自我怨恨的色彩。她们并不是不喜欢自由和妇女解放，而是不喜欢女性自己以及女性最本质的体现：成为一位母亲。在其他问题上，女性这种自我怨恨不突出，只有在谈到孩子时才明显地表露出来。什么时候要孩子，要不要孩子，一旦有了孩子，为孩子做些什么，这些都是令女性头疼的问题。

为什么热门职位 仍然排斥女性

妇女们一直期待公司能改变观念，而这一天似乎还不会到来。也许在绝大多数的男人中，并不希望大量的妇女占据重要的工作岗位，与他们平起平坐。我们仿佛被闭锁在没有门窗的屋子里，我们的出路在哪里？

只有当妇女能够以针锋相对的态度对待与她们作对的这种顽固偏见时，才能学会如何保护自己。只有到那时，才能真正意识到她们获得成功的代价。如果她们决意干，就必然能成功。

小心翼翼地迂回着，仔细嗅着，觉察出危险就在附近，并且意识到自己固有的薄弱点。树林看上去那么寂静、诱人，但她明白在树林中的某个地方有个令她恐怖的食肉动物潜伏在那儿。

“我原先在电视台有较高的职务，工作不轻松。我竭力使这一切看上去很容易，对我自

己，对我的同事都显得很容易，造成一种气氛，使大家都不去考虑，为什么决定将一位妇女推上高层次的岗位。我要尽一切可能让大家对此没有疑问，以此来保全自己。我丈夫以往常对我说，我煞费苦心是多余的。他说，你应该显示你的工作价值。你要让他们了解这项工作需要多少专门知识。你要向他们证明你自己的价值。除了你，他们干不了这份工作。当然，我丈夫是对的，可悲的是，即使我照他说的去做了，结果也不会好一些。

“每当我阅读报刊上关于妇女地位的报导，看到一些事业相当成功的妇女谈论妇女已经向前迈进了几大步的时候，我的血压就要升高，我希望她们能够讲实话。妇女们并没有被接受，她们不受欢迎。妇女每日每时地为争取向前推进一步而进行斗争。如果妇女作出进入公司领域的选择，她们就得作好思想准备，接受诸如外貌、个性等各个方面的测试。最为糟糕的是，妇女甚至有一半的时候，无法清楚地表达事情的进展情况，因为男人们已越来越善于掩饰他们对女性职员的感情。因此，妇女们还是做好思想准备，随时在并无确切理由的情况下被解雇，准备面临这么一天，坐在镜子前，凝望着镜子里的自我，愤怒地自问这是为什么。最后，不得不面对这一残酷的现实。所有这一切的理由只有一条：你是女性。难道不是吗？”

“我所经历的这一切，也在我的两位亲密的女友身上重演。这对我们大家都是一次痛苦的教训。6年前，我瞧不起一位妇女，她满足现状，决定不外出工作，呆在家里生儿育女。现在我也是如此。一旦你公正地面对现实，你就能更清楚地认清你的抉择。我不再被那些关于妇女成功的不切实际的材料迷住双眼。生命太短暂了，不能将你的毕生精力全部投入到某个重要官员的职务上去。

“但是我没有与公司工作一刀两断，我没有那么做。两周后，我又在一家大公司开始我的新的工作。我并不奉劝妇女们放弃实现

自己的愿望，放弃争取成功的努力。我们不能让步。但是，有过这番经历后，我认为现在该是妇女更坦诚地对待这个问题，更加现实地对待那些倒退现象，以及她们那种固执偏见的时候了。我有一种感觉，我们中间有相当一部分人被哄得产生一种虚假的平等和安全感。”

当然，有些男人对她的故事可能不予理会。他们会说这是一个好发牢骚、爱抱怨、永远不知足的女性。这种人就应当被解雇，现在，她居然把性别歧视说成是被解雇的原因，太可笑了。有许多这样的女人，利用她们的女性特征作为最终退避的理由，不是吗？这使她们开脱了自己在工作中应承担的责任。

你会听到男人们说以上那样的话。令人无法容忍的是有的妇女也讲这样的话。类似的经历是全体妇女所面临的性别歧视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却被男人们，甚至妇女自己歪曲为私人问题。性别、性歧视不再是上述问题的原因，而个人的性格和表现，却成了基本原因。如果她出了问题，那是她自己的过错，活该。她的服饰如何？过于女人气，还是过于男人气了？过多的涂脂抹粉还是不注意化妆？她是不是过于自信或争强好胜？她是不是担心男人会喜欢她而不是尊敬她？在小时候，是否经常参加集体比赛的体育项目？没有？这正是症结所在。她从未当过一名具有团体精神的运动员，当然不能胜任公司的工作。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为表面上的统计数字而沾沾自喜，在那些统计数字上大作文章。以致当有人说明情况，对相信妇女已在社会集团领域里取得很大发展提出质疑时，社会对这样的人群起而攻之。她是失败者，并不是一个好典型，她是反面典型。

有些男人与妇女在共处的气氛中各自强盛起来，持续不断的压力令他们振奋，日复一日的较量增强了他们的力量。他们喜欢搞权术、政治，在内部及外部的竞争中，既穷追猛打又以智取胜。也许更

严酷的是有那么一些妇女喜欢这种男女之间在商业上的竞争。这些妇女的精力消耗在力图消除、驳斥关于妇女工作越轨、野心等种种荒诞传说的挑战中，消耗在人们特别热衷的竞争中。

但是，公司的另外一些妇女没有在那种争权夺利的竞争中自强起来，她们不愿相信在那儿发生的权力之争会有什么结果，不相信女人的性别、荷尔蒙、子宫会有什么战斗力。

因此，需要特殊类型的妇女来对付各种各样的能够成功的压力。而妇女大多数都是相当平凡的——不能说智力超群、富有创造力，具有工作或思维能力——我们有的是激情。就成功本身而言，如果排除性别歧视，重要的是勇于投身到工作中的巨大激情。

将这种感情能量同妇女从处事冷静、工作效率高、不感情用事、非女人气以及把握成功机会的价值中汲取的能量结合起来，唤起她们最大的潜能来做她们的工作。这样做并不是不可能的，也不是不值得的。但却非常非常的难。尤其是当妇女有意为她自己在她的办公室之外建立另一种生活时更是如此。

“我开始经营自己的业务，我希望能够把握自己的生活，而不必与公司和公司政治产生摩擦。我离开了设计广告的工作，投资数千元将我的公寓作为办公室，开始了我的自由职业者的生涯。

“现在我的公司每年至少赢利 100 万元。见到我的人禁不住要猜测我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女人。大多数人认为我有一种真正的进取性格，一种锲而不舍的追求成功的精神。为了自己事业的成功，人人都得那样奋斗。但是，我不认为我具有那种性格，我觉得也没有那种必要。我在经营上作出的每个决定，在别人眼里都视为标新立异。就为这，我不愿意呆在某个公司里，想象着如何防止那种不愉快。我自己决定我需要的收入额，我努力工作达到这个目标。成功本身从来就不是我的动力。”

表面上，她是那种值得为其写一本遭遇奇特、富有感染力的传

奇的女性，借此颂扬那些在高阶层奋斗的女性。她 40 岁 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我觉得在公司里女性一直被轻视。一贯如此，无论是直截了当的还是稍加掩饰的，鄙视妇女的现象从未消失。我记得我第一次要求加薪时，他们对我说，我不可能需要更多的钱，因为我终究要结婚的，我可以依靠男人。”我想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我直到 35 岁才结婚，因而，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在等待，生活上只能靠自力。

为什么家业两全标志 女性真正的成功

成功是指以自己的选择去开创人生的力量，去获得自己衷心想要的而不光是别人给予的东西。我们都具有开创人生的力量，都会有那些高兴的日子。有时看一场电影、听一个故事、或读一本书、听一席话都可能增强你开创人生的力量。

母亲有家庭也应有自己的事业。那么什么才是成功的母亲呢？没有一种想象或观念适用于所有成功的母亲。总的来说，所谓“成功的母亲”是指那些不仅追求充实的人生，而且具有自知之明，明确知道什么样的充实人生才真正适合自己的人。她清楚自己应该懂得选择能表现自我的工作。她再也用不着别人给予的恭维和称赞。因为她已经明白，必须首先肯定、接纳自己，才谈得上独立自主。一旦她洞悉这个奥妙，她的保障就不再是银行的存款，而是存在于能够充分动用的创造性

构想中，存在于执着的追求中，她就离成功不远了。

中国妇女特别是已经做了母亲的女性，往往受到“人到中年万事休”、“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影响。她们中有的人在结婚生了孩子后就不再追求事业成功。在一些母亲看来，生活就像一道“二选一”的选择题。要么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事业，要么把毕生精力奉献给孩子、丈夫，做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其实两者并非是互相对立的，我们不必非从中选一项不可。处理得好，两者可以相互促进，使我们既获得事业上的成功，又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

使我们进退两难的是，自古以来“忠孝不能两全”的思想和单一的思维方式，总是固执地认为只有“舍小家才能保大家”。这种思维方式在“文革”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于是就有“夫妻离婚”、“脱离父子关系”、“脱离母子关系”等等诸多的“革命行动”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和情感来表示他们对党的“忠心”，换取所谓事业上的成功。如果在今天，我们仍然不能改变自己单一的思维方式，不变一元为多元的思维方式，仍然限制自己，固执地认为只能二选一，即：或做一个良母贤妻或追求事业上的成功，这其实是给自己套上绞索，挡住了自己前进的道路。

就好似那些一生过分强调“哺育与给予”责任的家庭主妇，把自己的青春与岁月全部奉献给孩子与丈夫后，可能会产生“没有自己”的失落感，从而导致心理上的不平衡。

又如那些无情无义的母亲，虽然锦衣玉佩，名车华屋，其内心世界却往往充满空虚苦闷，觉得人生毫无意义。由此可见，平衡感对一个人来说是多么重要！

但许多母亲不相信一个女人既能在事业上有成就，同时又有一个温暖的小家庭。然而，我相信。母亲应该追求事业上的成功，这是每个母亲的权利，这是执着追求的结果。

也许有人要问：“如果说成功是天赋于母亲的权利，为什么获

得成功是那么的不易？”

原因就在于人类与自然界的其它生物不尽相同。我们不同于一般的动物，我们有自觉的能力，有思维的能力。正确的选择会使我们成功。选择来自创造性的思考，来自思想的指导。人的思想像水一样“既能载舟，也能覆舟”。好的思想可以使你获得成功，而坏的思想只会使你一败涂地。

社会主义制度恢复了妇女做人的权利，为无数母亲获得事业上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要想不苦、不累，没有任何艰难险阻，舒舒服服就获得成功，是不可能的。在提醒母亲的同时，我也想送给父亲们一句雪莱的诗，“如果女人还是奴仆，男人会有真正的自由么？”我相信善解人意的父亲一定会理解这句饱含哲理的名言，帮助母亲去争取事业上的成功。

在现代社会中，女性参与的事情越来越多，涉足的面越来越广。女飞行员、女驾驶员、女厂长、女经理、女市长、女省长、女科学家、女教育家、女艺术家、女工人、女医生、女记者、女编辑、女银行家……种种社会角色真是五彩缤纷。正在这些女性的事业兴旺发达之际，一个不可避免的现实摆到了她们面前：结婚生子。

从医学的角度来说，一个女人如果超过 30 岁还不愿生孩子，则以后难产和胎儿畸形的可能性就要大大提高。一边是事业和工作，一边是生育后代，两副担子可以说是同等重要。从生命载体这一角度看，后者或许更重要。这真是摆在每一位女性面前的两难之事。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有的女性干脆不结婚，或者结了婚也不生孩子。加入这一行列的女性有逐年上升的趋势。而另一部分女性呢，只好放弃了工作和事业，放弃了提升和深造的机会，回到家里照顾小宝宝。这种情形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并非少见。第三种类型是把孩子全托到幼儿园去，每周接回来一次，这样似乎缓解了事业与育儿的矛盾。其实以上三种类型都不是完美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逃避育儿的神圣天职，过一种所谓“清心寡欲”的生活，实在是悖自然界的规律，不足取。

躲进金屋，与世无争，只知膝下小宝宝，不知国事天下事，那么她的领地只有巴掌那么大，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不比爱小鸡的母鸡更广阔些。

将孩子全托，每星期接回来一次。爱的毛毛雨很难实实在在地维系母亲与孩子的亲情。很难想象长期未生活在一起的母子之间会有很亲密的感情。

一位美国女心理学家这样写道：“我每次看到花就会联想到我的母亲。从我记事起，她就带我天天去散步，每次散步时她都指着菊花、玫瑰花或蝴蝶花大声说着花的名字。她停住脚步，神态虔诚地站在每一丛树、每一枝花或每一个花苞近旁，用鼻子轻轻地闻一闻，也把我举过去闻，告诉我它们的名称，讲它们生长的情况……时至今日，在我和母亲谈到我的童年时，没有哪件事她记不得。我们在一个账户上有一笔共同储存的记忆，别人谁也不会知道这个账号。”她记录了一段多么感人的母女亲情，又多么耐人寻味！

怎么解决事业与生儿育女这个两难的难题呢？在西方发达国家，越来越多受过良好教育的现代女性开始重新设计和掌握自己成年以后的生活。她们的做法是将自己依次纳入“铁三角”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潜心于事业。

第二阶段——专心做母亲。

第三阶段——用新的方法重新安排事业。

她们用这种“铁三角”的方法来使家庭和事业相得益彰而不是彼此矛盾。所谓“铁三角”实际上体现了女性三种角色的更替。开始时，女性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事业中去，此时她的角色是社会工作者；之后她又要全力以赴去哺育后代，全部或绝大部分充当做母亲

的角色；之后她又要回到社会角色中去并同时兼有母亲的角色。有识之士认为，要成功地完成三种角色的更替或转换，主要依赖于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对于自己为什么要在家养育孩子应有明确的认识。

第二，丈夫必须看重并支持妻子所做的事。

第三，妻子必须克服由此造成的心理上的失落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第四，把培育后代与工作 and 事业看得同等重要，全身心地投入去做这件事。

第五，还要经历重新投入工作的考验。

目前，要在我国推行这种“事业—家庭—事业”的女性新模式还有种种的困难，但我相信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好转，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这种“事业—家庭—事业”的女性新模式一定会得到重视和推广，它将无数母亲从力不从心的“双肩挑”的重担下解放出来，并为她们取得育儿和事业上的双丰收创造有利的条件。

为什么现代女性渴求 真正的伙伴关系

以前，女孩子生活的首要目的就是要找到一个丈夫，而且要尽可能地找到一个社会地位和职业地位均有良好保障的男人。男孩子得到的教育却是要他们坚强。在这样的教育下，如果男孩子将来没有能力养育一家，他会感到自己是一个失败者。

现在，教育方式发生了变化，不再教育女孩子只要想方设法‘捕获’到一个男人。男孩子也不一定永远都要强大。前面已经谈到过，女孩子和男孩子现在能同堂学习，他们上相同的小学、中学和大学。在很多情况下，男人和女人已经从事相同的职业，尽管真正的机会均等还远远没有实现。英国前首相梅杰说过一句话很发人深思：“妇女仍然像障碍赛马的马一样，绑着前蹄在职业生涯中跋涉。”

有能力胜任职业工作的女人，或者已经习惯和男人伙伴式地共事的女人，她们的内

心里也希望建立一种真正的伴侣关系，在这个关系中，双方应当能够建设性地探讨“生活事宜”，决定权不应当只在男人一个人手中。

如果一个女人和丈夫一样从事全日制的工作，她肯定不希望家务活全落在她一个人的肩上。但是又有谁愿意舍弃自己舒适的日子呢？

女人们经常说，她们总是一直争取合理地分配家务活，通过有计划地安排工作来创造男女平等的氛围，但是到最后总是事与愿违。如果事情这样不断地积累下去，总有一天诸如没有倒垃圾之类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或者丈夫永远也改不掉的随便乱扔脏衣服的毛病会导致“忍无可忍”。以后发生的冲突非常明确地告诉双方，事情这样下去是不行的。男人不参加家务劳动的事实，从深一些的层次来讲，说明男人对女人的职业工作和成就缺乏尊重。妻子在工作单位经常有好点子，深受一块儿共事的男同事的赞赏和尊重，但是惟独她的丈夫对她所说的一切和所建议的一切不屑一顾。终于有一天女人会对丈夫说：“既然你不知道尊重我，那么你走你的路，我不再跟着你了。”于是分手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其实她早已决定要分手了。只是没有拿出实际行动罢了。

在职业生活中，人们称和工作单位逐渐脱离的过程为“内心辞职”。工作人员虽然人还在工作岗位，还在根据职责和义务“完成”自己的工作，但是他的心早已不在岗位上了。为了实现企业的目标而和企业同心同德的积极性早已消亡，为了共同的事业而奋斗的劲头早已泯灭。换公司或者自己成立公司，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生活中的女伴也同样如此，她们或者会找另外一个男人，或者宁愿独身一人过下去，也不愿意在耗费精力的环境中生活。因为在这种环境里，她们每做一件事都觉得自己对不起自己，之所以还留在这个男人身边，只是因为害怕以极端的方式结束两人的关系。一旦女人认识到自己自欺欺人的态度和举止，她们就会改变这个局

面。

男人在家庭生活以外还过着自己的“私生活”，这对他们来讲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与此同时他们却要求妻子“温顺地”待在家里等候他们回来，这对他们来讲也同样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在真正的伙伴关系的框架内，一个解放了的女性要求能过上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生活。她也有自己婚前就已经形成的朋友圈子，也有自己的固定关系，也希望能把这些友谊关系继续维持下去，而且不是每次都要和丈夫在一起，常常也希望独自一人来处理这些关系。为什么女人在婚后就一定要像个挂坠永远依附在男人的躯体上呢？她为什么不能过上自己的生活？如果丈夫不喜欢滑雪，而妻子却很喜欢滑雪，那么为什么她就不能用上一个周末或者至少一天的时间和朋友外出滑雪呢？丈夫在业余时间和朋友们捣鼓自己的业余爱好，而妻子对此却丝毫提不起兴趣，对这种一边冷一边热的情况，男人感到扫兴。作为女人来讲，她们已经付出了很大的精力试图去迎合男人的兴趣；但是作为男人来讲，他们压根儿从来没有考虑过要去迎合女人的兴趣，他们从来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刚开始发生冲突的时候，双方还试图互相忍让，指望能达成共识：将来如果丈夫从事自己的娱乐活动，妻子也有权和朋友外出享受一番。但是从男人话语的字里行间中，总是可以听出来，他对这种约定安排是不情愿的。男人会说：“上一次我回家比她早。再说，邻居看见我们各行其道，会怎么说？肯定会议论，说这家的夫妻关系出问题了。”

在这种情况下，最终往往会因为一点小事而闹得不可开交，把原本潜藏得比较深的问题一览无余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事情最后还是得以分手而告终，因为妻子清楚地认识到，丈夫根本不愿意看见妻子有自己鲜明的个性，有自己的兴趣，有自己的朋友圈子。丈夫想尽一切办法要剥夺她的一切。这个时候离开丈夫难道说理